

NATIONAL THINK TANK

国家智库

“政·智”时代

谁在挑战中国的文化安全

两套机构设计助力经济解困

国务院高参破解智库密码

解放军将领阐述中美关系三大构想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CHINA REGION DEVELOPMENT & REFORM INSTITUTE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NO.1

NATIONAL THINK TANK

国家智库

“政·智”时代

谁在挑战中国的文化安全

两套机构设计助力经济解困

国务院高参破解智库密码

解放军将领阐述中美关系三大构想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CHINA REGION DEVELOPMENT & REFORM INSTITUTE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NO-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智库.第1辑/任玉岭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17-9828-5

I.①国… II.①任… III.①经济政治—研究—中国
②社会政策—研究—中国 IV.①F120②D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8044 号

策划编辑 路 巍

责任编辑 贺 静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巢新强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6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17-9828-5/C·54

定 价 20.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9418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6834422588386794

主办：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协办：百人科学公益基金
编辑：《国家智库》编辑部
出版：中国经济出版社

凝聚中华民族理想 致力国家发展进步
为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储备
NATIONAL THINK TANK

国家智库理事会

名誉顾问：陈昌智 陈宗兴 钱伟长 吴阶平

政策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少阶 王富中 刘伯鸣 刘吉

任启兴 任玉岭 吴晓青 杨多良

陈明义 何加正 段应碧 徐锭明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厉以宁 卢大伟 纪明葵 叶文虎

冯延龄 张卓 林毅夫 陈栋生

单秀法 巫致中 胡乃武 徐光裕

萧灼基 郭东亚

理事：（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军 华旗资讯集团总裁

朱中华 中国人民武警部队特警学院副院长

吴鹰 数字中国联合会主席

张重庆 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秘书长

郑中山 先达科技董事长

蔡永峰 中国食品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国家智库总编辑团队（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今 毛增余 方岳 任玉岭

刘钜波 同利军 纪明葵 高路

钟彬

常年法律顾问：敬云川

《国家智库》2010年第一辑

主编：任玉岭

编辑一部：胡月英 邱剑敏 李正强

编辑二部：王延辉 焦健 杨振宇 孙颖

英译编辑：胡傲

版式设计：傅蓉慧 摄影师：依山武士

承办：百人思维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电话：（010）66047027（编辑部）

电子信箱：ttoc@ttoc.org.cn

国智网：www.ttoc.org.cn

地址：北京西长安街35号信箱

邮编：100031

Contents

2010年第一辑

卷首语

001

怎么创造一流智库

任玉岭



根据本人50年的工作实践，特别是近20年来的参政议政经历，我深感做好建言献策，必须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以我看，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是搞好建言献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只有多走、多看、多读、多学，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概括地讲，要做好智囊和参谋需要做好“六个三”……

封面文章

003 “政·智时代”

思考

004

74之痛：中国智库的羁绊在哪

于今

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收录的中国智库只有74家，而美国智库达到1777家。对此，除了西方智库研究学者对中国智库存在偏见的因素，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智库，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还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不论是公众、政府决策机构、学术界、舆论，还是智库局内人，对于目前中国智库的状况都不很满意。这一现状的原因何在？

环球智库

008

它们何以出名

——解密国际著名智库的成功经验

智库文摘

015

中国智库的萌芽：智囊

智者论道



我国现行智库存在的问题 021

俞可平

后危机时代中国怎么办

高尚全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实现复苏。但与此同时，后危机时代也对中国提出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面临怎样的后危机时代？中国在这一时代的发展中应注意避免哪些问题？中国又如何在发展中推动改革的走向？



城乡统筹贵在解决大城市发展

蔡继明

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特定制度和政策环境下的产物。尽管这种城市化模式，对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大城市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能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比中小城市更能集约和节约使用土地，且更易于控制和减少污染。因此，我们应对“小城镇”的发展做出明确的界定和科学的规划，并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加快城市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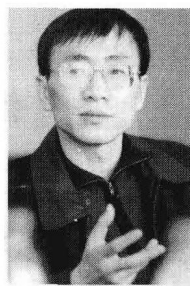


026

两套机构设计助力经济解困 030

李曙光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在经济监管环节制度设计上的缺失日益凸显。未来需要成立独立的金融国资委管理我国总量庞大的金融性国有资产，统一担负控制金融风险、进行金融业结构性调整、国有金融资产产权界定与保值增值，以及负责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四大职责。同时，亟需成立金融国资委和破产管理局来监管、调控经济运行，理清关系，规避风险。



035 “八部曲”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中美关系三大猜想

纪明葵



039

未来中美关系可能存在三种结果：一是中美冲突关系；二是中美合作关系；三是中美竞争关系。而在我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美竞争关系才是中短期内最大的可能。中美两国应力避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一个以彼此长期共存、共荣为核心的大战略目标。中美共处必须改变传统思维习惯，应重视未来，重视总体，准确把握大变局中的利益关系变动。

中美差异及其关系处理之我见
饶及人

谈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话题，毫无疑问两国肯定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的，我认为追根究底还是两国对一些事物的看法、生活价值，以及思维模式不同，作为一个在美国成长的中国人，我深切观察并体会着这些差异。



042

049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八倚重”

杨再平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已完全过去。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有更深远的警示，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倚重局限、极限已显，必须有新的倚重，我国经济才能根本好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三位一体”构建和谐收入分配关系 053

关于转型时期中山市创新发展理念和转变发展模式
模式的思考

产业透视

064 中国奶业发展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孔祥智 钟 真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中国奶业朝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政策制定者面前。要同时实现保障质量和奶农稳定增收这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目标,我们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奶业发展道路?是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规模化家庭牧场的道路,还是走小区化集中养殖的道路,抑或是企业自建奶源、让奶农成为产业工人的道路?

铺就国家安全的“耳目”与神经系统

李德伟

离歌唱响,挽歌何觅。3月23日,谷歌宣布其搜索业务退出中国内地,并交将搜索服务转至香港,谷歌命运已见分晓。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些隐秘的原因以及些许反思的问题。

069

软实力

071

谁在挑战中国的文化安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课题组

中国文化安全外部不断受到西方国家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渗透和挑战,全球化的文化产品侵入冲击着中国文化安全,不断发展的传播手段对中国文化安全也形成威胁。在内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不够。中国尚未形成健康、完善的文化建设制度,文化产业发展缓慢,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且文化发展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对此我们应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化创新,逐步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应对西方文化:中国的一道百年难题 083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取舍? 085

热读

087

特别为以下读者奉献

- ◆ 智库机构:全国2500多家官方、民间、专业、综合智库机构,3.5万管理人员和专职研究人员,以及27万工作人员
- ◆ 学术界:全国各高校校(院)长、工商管理学院教学与研究人员,全国各大图书馆及资料室
- ◆ 首脑与政府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及相关机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全国600多个城市市委书记、市长,全国2800多位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区长
- ◆ 国外驻华使(领)馆
- ◆ 产业与工商企业界商界领袖:包括国资委大型企业150家,3000多家上市公司,民营企业500强,乡镇企业500强,全国优秀和知名企业领导人和管理层
- ◆ 英文版面向4000多家全球智库研究人员

《国家智库》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虽然不断壮大，但总体上还是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鉴于我国智库在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主办、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全国公开发行的《国家智库》于2010年“两会”期间问世。《国家智库》将当前学术或政策论述、研讨成果或政策建言，以易于大众阅读的语言编撰成书，旨在为推进智库自身的发展提供一个能够直接反映和充分体现智库内容探讨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为社会各人士提供一个了解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窗口；从而进一步为政府领导人和企业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与参考。

《国家智库》期刊每年6本，每双月出版，年底汇编成集中英文版，全国发行。希望得到各行各业有识之士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稿件和重要的信息。

《国家智库》(NATIONAL THINK TANK)特别突出权威性、建设性与可读性，共设有封面文章、大国关系、公共民生、产业透视、软实力五大版块，以及智库研究、智者论道、时事评析、环球智库等次级栏目。

《国家智库》的创办目标是：“凝聚中华民族理想，致力国家发展进步，为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储备。”



任玉岭

国务院参事，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著作：《任玉岭文集》、《“三农”问题研究》、《民生建言》、《招商引资的艺术与实践》、《任玉岭访谈录》等

怎么创造一流智库

——谈如何做好政府的智囊与参谋

《国家智库》的问世，是一件大好事。它不仅有益于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利于把中国各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好；而且也为广大有志于充当智囊、参谋的专家和学者开辟了一个献策、建言、展示才干的天地和平台。那么，该怎么样献策和建言？怎样担当好智囊和参谋？这需要所有志在献策和建言的专家和学者认真研究和对待。《国家智库》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平台，该怎样保证质量、提高水平，登载什么样的建言和文章，也需要有一个目标和准绳。

根据本人 50 年的工作实践，特别是近 20 年来的参政议政经历，我深感做好建言献策，必须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以我看，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是搞好建言献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只有多走、多看、多读、多学，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概括地讲，要做好智囊和参谋需要做好“六个三”。

第一个“三”是“搞好三个学习”。一是学习

党的指导思想；二是学习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三是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很多智囊人物都是知识渊博、专业功底深厚的专家和学者，充分发挥智囊人物的专长十分重要。但是，因为对国家的献策、建言，有很多是涉及全局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因此要想做好献策、建言，需要不断学习。尤其要重视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要了解党的指导思想的一贯性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只有吃透中央的精神，我们的工作才会方向明确，才会有真正的依据和准绳。另外，中国的很多古籍和外国的很多经验中，都不乏一些有益的东西供我们借鉴。因此，在献策、建言中，一定要善于更多地学习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和外国的好经验，这样才能使献策、建言根植于深厚的基础中，才能更具说服力和建设性。

第二个“三”是“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一是正确对待自己；二是正确对待广大人民群众；三

是正确对待政府官员。建言基本是针对政府的工作而言的，有的是政府尚未关注的，有的是政府已经做了一些努力的。因此，我们在献策、建言时，一方面不能无视政府官员已经做出的努力，要全面了解已出台的政策和法规；另一方面一定要相信群众，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呼声。作为智囊和参谋，针对某一问题进行献策、建言时，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全面了解情况，做到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广大人民群众、正确对待政府官员。对人、对己、对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只有通晓全面、切中时弊、抓住关键，才能使献策、建言寻找到好的切入点，并能有理有据地对问题的曲直、大小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断。

第三个“三”是要“坚持三不”。一是不人云亦云；二是不老生常谈；三是不说套话、空话。人云亦云、老生常谈，以及说套话、空话的情况在很多地方和部门是经常发生的，出现这种情况有一定的个人原因，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有些人因为平时不深入学习，又缺少调查研究，要他讲话时，他就不得不人云亦云，不得不老生常谈，不得不说套话、空话。另外，因为“五八”年和“文革”中，很多人因讲心里话、讲真话被打成了“右派”、“右倾”，甚至“反革命”，而人云亦云，老生常谈，善讲套话、空话的人却平安无事，甚至被提拔重用。于是，这就造成了人云亦云，老生常谈，说套话、空话的情况比较普遍。作为智囊和参谋，要想做出有益的献策和建言，一定要多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多一些胆量和勇气，这样才能使其献策、建言更有新意、更有内容、更有针对性。

第四个“三”是要“强调三真”。一是强调献策、建言的真情实意；二是强调献、策建言的真实可靠；三是强调献策、建言的真知灼见。这“三个真”，各具内涵，但又有其一致的特点。献策、建言必须要有真情实意，这个“真”一方面来自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一方面来自对广大百姓的热爱。党的事业是为人民大众的，反映民众的心声就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因此，真情实意和真实可靠对献策、建言是十分必要的。真知灼见是与真情实意和真实可靠联结在一起的，有了真情实意的态度和真实可靠的依据，就一定能够提出高水平的建议。如能进一步重视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优良传统的弘扬和对外国经验的吸取，这样的献策、建言就一定能成为真知灼见。

第五个“三”是“提倡三性”。一是提倡建言的前瞻性；二是提倡建言的战略性的；三是提倡建言的全局性。了解全局、兼顾方方面面是搞好献策、建言的重要条件。再说作为智囊和参谋，所提献策与建言多涉及国家大事，很多建言都可能影响全局、影响长远。所以献策建言绝不能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更不能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而忽略或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今天的改革遇到较大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时，我们更应该防止只重富、不重穷，只重大、不重小，只重锦上添花、不重雪中送炭的倾向发生。为此，智囊和参谋的献策、建言，一定要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

第六个“三”是“抓住三个关注”。一是关注实际；二是关注群众；三是关注民生。温家宝总理曾送给国务院参事们两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当好智囊和参谋，要了解国情，必须要深入实际、关注实际、深入群众、关注群众。“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作为智囊和参谋，一定要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更好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更多地倾听群众的心声。普通民众是社会人的大多数，“普通人”的问题应是社会的基本问题。我们讲公平、正义，就是要使“普通人”走出不公平、不正义的阴影，像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讲的那样，“让我们记着，公正的权利，必须贯彻到社会的最低层”。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关注民生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奋斗和工作的宗旨所在，也是搞好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要害与关键。要使全体人民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作为智囊和参谋，一定要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应在解决收入分配方面、在推进城市化方面、在医疗和教育改革方面、在实现居者有其屋方面……担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

以上“六个三”，是我长期实践工作的感受和体验。在当今国家快速发展、改革迅速推进的情况下，作为智囊和参谋，要做好献策、建言，不仅需要在这“六个三”方面下工夫，而且还需要进一步谙熟民情，敢于直言。有时还需要顶着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攻击，为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做出应有的贡献。

“政·智”时代

每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总会成为中国上下瞩目的焦点。这不仅在于“两会”是中国政界最高级别的会议，更在于这是一个全民献智、进言谏策的平台。但在今年的“两会”上，“被代表”一词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用来形容百姓的意见被一些所谓的“代表”代表，真正的民意并没有体现出来。

“被代表”一词的出现反映出百姓对一些代表委员的不满，更折射出近些年来代表委员提案质量的下降。而作为向政府建言献策的一个重要“智库”，提案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得不到政府的关注和解决。长此以往则势必会加重社会矛盾，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

而在提案之外，如何架起沟通百姓与政府间的桥梁？如何发挥各行精英的专业知识献计谏言？以及如何处理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处理好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大国、要国的关系？这些都是中国“智库”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形势，而中国自身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发展的机遇与改革的挑战并存，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前所未有的向中国提出了

政策咨询的强大需求。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中国智库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围绕“政”字展开的参政、议政、问政等活动都需要以智库为支撑。因此，可以说，当今中国正进入“政”、“智”密不可分，相互渗透的时代。

纵观国际一流智库，它们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关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相比之下，中国智库的发展和影响力却相形见绌。

那么，作为代表委员，如何把握住问政关键？或者更扩大一步讲，作为政府智库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们如何向政府提出建议？中国的一流智库又该如何打造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计民生？本期封面文章将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以飨读者。

本栏目《74之痛：中国智库的羁绊在哪？》、《它们何以出名——解密国际著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智库的萌芽：智囊》摘自“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智库》。

项目负责人：于今

撰文：于今



于今

现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负责人

兼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理事，辽宁省驾驳论研究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

著作：《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丛书》、《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辅导百问》、《城市更新概论》、《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西部大开发》、《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以战略思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间组织应在民族文物保护领域进一步发挥作用》等

74 之痛：中国智库的羁绊在哪

在《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收录的符合条件的中国智库只有 74 家，而美国智库上榜者达到 1777 家。但事实上，据媒体报道，中国现有的智库数量已逾 2000 家。也就是说，中国智库中超过 96% 的智库是不符合全球智库标准的。一个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形势，中国自身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前所未有地向中国提出了政策咨询的强大需求，因此，可以说，中国智库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从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看，却又面临种种问题，可以说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甚至有人从智库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性特征上得出结论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还太少。被《2008 年全球智库报告》收录的

只有 74 家，成为关注中国智库发展的人们的心中之痛。对此，除了西方智库研究学者对中国智库存在偏见的因素，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智库，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还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不论是公众、政府决策机构、学术界、舆论，还是智库局内人，对于目前中国智库的状况，都不是很满意，原因在哪？问题出在何处？归纳总结学者们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探讨，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的扶持力量不够大，缺乏有效的相应配套措施

国外智库之所以发展很快，与其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中国政府对于智库的支持力度还



不够大。一是经费支持。国外的智库一般能够从本国政府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如，美国政府就设置了专门为各个智库提供资助的机构；日本政府每年拨给思想库的经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英国政府是思想库1/3的业务雇主，并设有“海外工程基金”资助思想库向国外工程报价。¹而中国政府目前在经费支持上的力度还比较小，在政策研究上的投入还不够。有报告曾经提到，中国政府每年用于政策研究的项目经费相当于1.5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经费（中国每年要修建3000公里高速公路）。这说明，我们一个科研项目可以花上几亿人民币，但对国家与群众影响更大的政策研究上仅花十几万人民币。²二是需求支持。政府决策咨询，尤其是政府对民间智库的政策咨询市场还没有形成。中国安邦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贺军认为³：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中国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中国在历史上一向有集权的传统，这源于长期封建社会下的“家天下”制度。即使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等重大战略决策，基本上也是以自上而下的模式来推动——其战略决策不是发端于公民社会，而是来自于中国高层领导人、执政

党和政府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已经比较多元化，民间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一定程度的资源支配空间，但在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方面，政府还是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这个体系至今仍然很封闭。政府当然也有咨询机构，但官方或半官方的智库，往往带有行政与学术结合的性质，其政策研究与制定通常带有部门倾向，即以政府部门为主的政策往往由该部门制定；部委一般涉及内部利益，其政策制定难以突破部门利益格局。相对于官方智库，各级政府对民间智库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强度不足。⁴汤敏在接受《商务周刊》的访问时也谈到⁵，现在政府采纳社会上的意见主要有三种形式：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形式不一的向专家征求意见和少量的委托独立的机构为政府做研究。前两种方式固然重要，但任何一项政策，特别是大的政策制定需要很深入的研究支持，靠个别专家的力量就显得深度、广度不够。现在民间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显得很零星，缺乏系统性。比如听证会，需要对议题有过专门研究的人或者机构来提出意见，而不能只靠一两个专家提出意见就行了。因此，真正的决策咨询市场还没有形成，政府对决策咨询的强大需求还没有形成，从需求上对智库的支持也就不足。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政府政策系统偏重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忽视系统中的咨询、评估甚至终结等环节，而政策制定与执行又习惯于统一思想、“众口一词”和“试行”制度。⁶其次，政策分析研究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交流的渠道太少，还不够畅通，智库对政策研究的需求还不是非常清楚。最后，法律和政策支持。国外智库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在美国，咨询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与运作等各个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以供参考；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后相继制定了《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和《中小企业指导法》等，为思想库协调、有序地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⁷除了使咨询成为法定程序以外，发达国家对智库还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如智库享有免征所得税和财产税，公司和个人对思想库的

捐赠可从应纳的税额中扣除等。

而中国在法律与政策支持方面，政府虽然在政策制定中有咨询论证这一环节，但在政策的质询、监督等公共决策程序方面还没有完全制度化，在法律上还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必经的步骤，政策咨询的政府采购机制、智库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和公开讨论的机制等都没有建立。也就是说，决策是否经过专家决策咨询、哪些领域的决策向专家咨询、采取什么方式咨询、专家咨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等问题，不是依据相应的政策、法规，而是取决于决策者的素质和需要。同时，在对智库的政策支持方面也没有正式的文件，智库的法人地位还不够明确，还不能保证智库能够合理、合法运行并得到有效规制。2005年工商总局对企业名称进行一次规范化行动，所有非营利机构必须以公司形式注册，并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这使得很多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智库由于找不到政府单位当“婆婆”，而没有条件或途径去申请“民办非企业”，而只能成为企业的二级机构，没有独立的法人权利，没有正式的归属。⁸这必然影响到我国智库的发展。在2009年初由美国学者发布的“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报告中，符合条件的中国智库只有74家，而美国拥有智库1777家。《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专访“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时，专门问到这一问题：“中国媒体报道的中国智库数量超过2000家，而在您的报告中，只有74家，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距？”詹姆斯·麦根的回答是：“我听说过中国智库数量庞大，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份正式的中国智库名单列表。要在中国获得详细的资料确认中国智库的地位并非易事。”看来，我国智库的法人主体地位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国际上对我国智库的评价。

民营企业对智库的支持不够，在全社会和企业中没有形成对民间思想库的捐赠制度和文化氛围

除政府对智库的扶持力度不够大外，与国外智库相比，中国民营企业对智库的支持力度也不够。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

敏在接受《商务周刊》的访问时，对此有很深的见解。他说：“民营研究机构是要靠民营企业来支持的。我国的民营企业还在成长初期，他们对民营研究机构的注意与认识都还不够。民营企业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在政策制定上参与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民营研究机构系统地反映他们的需求与意见的必要性。我国的民营企业愿意花大钱来做广告，也愿意花一些钱来做公益事业，但不愿花钱来支持与他们利益有极大关系的政策研究……很多民营企业认为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事，部分还有搭便车的心理。这些政策研究，不是对哪个单个的民营企业，而是对全体民营企业都有好处的。如果大家都有搭便车的心理，没人付油钱，这辆车就开不动。”⁹的确，中国企业多数处于发展初期，经济实力较弱，还缺乏参与意识。同时，中国的捐赠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捐赠的免税制度所使用的范围比较小，如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只有捐给红十字会等才免税，其他的捐赠就只好实行，对非营利性的智库的捐赠制度更是没有专门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智库的资金来源，制约了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的发展。

受文化观念的束缚，公民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影响了智库的发展

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政治行为，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有学者指出：“大众的民主意识以及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热情也是思想库影响力的重要约束之一。”¹⁰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是促进智库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和尚未完全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思想观念一起，影响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发展。我国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两千年之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线的政治文化，长期文化积淀，使得民众形成了“与世无争”、“怕与官衙打交道”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人们的利益观

念和公民意识在觉醒和强化。但由于市场经济的私利型文化和发展阶段的限制，当前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物质化倾向，政治关注的内容也变成务实化的特征，人们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利益，对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姿态。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薄弱，一方面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垄断性难以打破，民间的声音和大众的声音难以进入决策视野从而发挥政策咨询的作用，影响智库的需求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智库通过大众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从而影响了智库的发展。

思维模式缺乏创新性与开放性

中国智库的发展还受到传统的思维模式的束缚和制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尊崇思想，和

一直以来的分科制、应试型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国学者知识有余、思想不足，专长有余、通晓不够，思维守成，尤其是理论思维能力比较欠缺的思维方式，再加上某些研究者缺少现实历练，往往导致研究的结论模糊论述多于精确描述，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分析较少，从而导致研究成果的实际意义有限，很难为决策者提供令人信服的分析与建议。^[1]

- 1.卢晶颖：《中国思想库建设的环境因素探析》，http://lw23.com/paper_4932211/
- 2.虞立琪：《天则为什么还没有做大》，《商务周刊》，2003年7月3日。
- 3.《中国崛起呼唤民间智库》，贺军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307>
- 4.洪伟、邓心安：《中国民间思想库：作用与对策》，《科学与管理》，http://www.bio-economy.cn/data/2009/0411/article_157.html
- 5.虞立琪：《天则为什么还没有做大》，《商务周刊》，2003年7月3日。
- 6.侯经川、赵蓉英、邱均平：《全球思想库发展综述》，《预测》，2003年第6期。
- 7.卢晶颖：《中国思想库建设的环境因素探析》，http://lw23.com/paper_4932211/
- 8.《天则所的影响力在哪里》，<http://blog.huanqiu.com/?uid-59443-action-viewspace-itemid-289660>
- 9.虞立琪：《天则为什么还没有做大》，《商务周刊》，2003年7月3日。
- 10.朱旭峰、苏任：《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2期，第25页。

它们何以出名

——解密国际著名智库的成功经验

当前，我国智库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对于较晚起步的中国智库而言，美国和欧洲的智库无论是历史、规模，还是实力和影响都要高出一筹。起步早、历史长、机构多、人员广、成果多、影响大、发展成熟的国外著名智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智库认真吸收国外同行的经验，可以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从而在国家决策、政府制定政策及其他社会公共咨询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英文名称: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英文网址: <http://www.brookings.org>

成功经验:

非常注重对政府决策的参与
布鲁金斯学会长期关注公共政策问题，一直有研究政策的传统并且把公共政策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另外，它通过与政府成员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而影响政府部门甚至政府首脑的决策。它不仅每年几乎都有

人员在政府里任职，而且每年提供许多的学习和进修机会给各级政府官员，从心理上影响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接受该学会的思维和思想。

积极发挥政治影响力

自成立之日起，布鲁金斯学会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主要包括对政府的政策影响力和对公众的舆论影响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影响政策和公众舆论，学会积极跟踪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展脉搏，并就此组成专家项目组经过研究向政府提交对策报告；通过向国会提交报告和作听证等方式，对美国政府的机构设置发挥重要影响；充分发挥其在华盛顿思想界的重要影响，成为探讨国际问题和释放国际信息的重要平台；通过国会听政会、政策评述、媒体采访、报纸社论、书籍、讨论会、国际会议、互联网等方式把研究成果提供给公众。

坚持中立的研究态度

虽说学会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并不一味地屈从于当权者。在不同的时期，该学会被当政者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学会反对自己的“新政”，罗斯福

认为学会太过于保守；因为学会收拢了众多的“自由派”敌人，尼克松认为学会太过于激进。面对最高当权者，布鲁金斯学会勇敢保持中立立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迎合统治者。为了保证这种中立性，它一方面对政府的资助实行限制，政府的资助额不得超过总收入的 20%；另一方面不接受秘密的研究，即拒绝接受不可以公开研究结果的研究，以避免使研究机构沦为政府的附庸单位。

为政府提供和储备人才

学会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历来非常密切，其人员在政府和智库内外的“旋转流动”，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政府与智库之间的“旋转门”关系，因而被称为“联邦政府的人才储备库”。学会的不少经济专家都曾担任过政府财政税收政策方面的策划人，而许多政界高官下野后也都愿意到此谋得一职，在潜心研究、养精蓄锐的同时，利用学会在华盛顿政界的地位和知名度继续发挥政策影响力。

注重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学会把高质量的研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十分珍惜

高质量研究所带来的良好信誉。为了保证高质量的研究，学会以高薪聘请一流的研究人才，以高成本创造高收益。同时，从创立开始，学会就非常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尤其注重调查研究，以保证政策研究的可信性与准确性，通过不断提高的研究质量，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美国兰德公司

英文名称：RAND

英文网址：<http://www.rand.org>

成功经验：

正确定位，高起点、高投入 成就兰德奇迹

兰德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具有清晰的思路和长远的眼光，以全球顶级咨询公司作为自己公司最终企望实现的战略目标，并以此为公司向前发展的动力。较高的定位保证了兰德公司沿着正确的轨道快速发展。一系列大手笔经营使得兰德公司及时把握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彰显了兰德领导者的勃勃雄心与远大志向。公司创立伊始，兰德项目组第一次对外招聘就招募了 200 多人，专业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心理等多个领域。兰德公司招募各种专业的研究人才并促进他们之间的充分交流，以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与此同时，兰德在创立之初便瞄准热点问题开展研究，扩大影响，吸引高层注意。公司在完成第一个研究课题《实验性环球空间飞行器的初步设计》之后，并未按部就班地走下去，把研究方向锁定在卫星领域，而是非常关注当时世人瞩目的朝鲜战争，并且敢于向五角大

楼以 200 万美元的高价叫卖自己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成果。

高投入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为此，兰德一方面利用战时与军方合作建立的人脉，保证了来自空军方面的资金；同时选用资本背景深厚的小 Rowan Gaither 出任公司筹备负责人，有利于吸引银行、基金会的投资（小 Rowan Gaither 本人就是福特基金会的负责人）。另外，在兰德理事会人选上，包含了学术界、工商界等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方便了日后业务的开展。为弥补自身在专业领域的不足，兰德充分发挥专家力量，对于一些新课题多次组织专家讨论会。以上这些政策表明，兰德管理者对投入资金应该达到的目的十分明确，也熟悉从资金到最终成果整个流程的运行机制，他们不仅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宏大”的发展战略，也相应配备了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实施方案。

正是兰德创始者在发展初期的卓越胆识、独特眼光，以及“扩张性”的投入，才成就了后来的兰德奇迹。

保持独立性传统，倡导自主性研究，不断促进创新

长期以来，兰德公司一直保持着独立性的文化传统，坚持自己只是一个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工作。兰德公司努力通过拥有不同性质的客户的形式来保持其独立性。虽然兰德的客户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个客户而言，比如五角大楼，其内部也有陆、海、空、情报、国防部长办公室等机构，有许多不同的部门。兰德通过与不同部门打交道，来实现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兰德还有许多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

客户等。

兰德公司的独立性还体现在其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上。也就是说，作为政策研究机构，兰德敢于说“不”，敢于讲真话，无论这个真话对客户有利或是不利，甚至可能出现兰德的研究结果同客户的政策相互冲突。一些客户正是害怕兰德的这种独立性而不敢雇用兰德。兰德公司在建立之初就强调自己是一个独立、客观、非营利性、不代表任何派别的咨询机构，并在自己的各项研究工作中自始至终贯彻这种理念。这种特立独行的工作作风帮助兰德取得了很多其他咨询公司无法做到的新颖成果，为公司树立起了良好的声望，也因此赢得了客户的尊重。美国各级政府开展有关政策制定的研讨会，往往要邀请兰德的专家参与，除了借助他们在专业领域的丰富知识外，更看重的是其独立的研究精神。

兰德公司的这种独立性是有一个由 20 多人组成的监事会来保障实现的。监事会成员对兰德公司具有管理支配权力，也就是说他们才是兰德公司真正的主人，但是他们并不拥有兰德公司的任何财产。

兰德公司的自主性研究突出体现在其咨询产品的形式上，不少研究项目都是由研究人员自行立题开展的。兰德公司鼓励研究人员特别是年青人充分发挥想象力，提出独特的见解，并进而开展相关研究。公司内有一条特殊的规定，叫做“保护怪论”，即对于那些看似异想天开或走极端的“怪论”不但不予以禁止，反而作为创新之源加以引导和保护。为了给这些自发课题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兰德公司在成立后不久与福特基金会达成了援助

协议，建立了公司内部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面向新领域的研究课题。正是这种开放的思维，使得兰德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大，服务对象也从原来的只针对军方，甚至仅仅是空军扩散到政府的多个部门及私人企业。

高瞻远瞩，把握研究方向，选对重点研究领域

作为一个咨询公司，兰德公司在自身研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清醒地意识到公司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选择一些重点领域来发展。也许是受其一贯重视的未来学理论的影响，兰德把目光主要放在了一些刚刚产生和兴起的新技术、新产品上，如卫星、空间飞行器、人工智能、数值计算、网络、系统科学、新型毒品等。在兰德的决策者眼里，这些新生事物必将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而兰德也由于在这些专业方向上预先开展的研究成为该领域内的权威机构。

1946年兰德项目组刚刚成立，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有关人造卫星的初步设计；20世纪50年代初，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过不少有关卫星的研究报告，详细论述了人造卫星在未来作战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但并没有引起当时五角大楼官员们的重视。直到1957年苏联抢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证明了兰德公司在该领域所做的一系列预测是正确的。此后，兰德公司逐渐受到美国政府的器重。

巧妙选题，成功抢占高端咨询领域

兰德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巧妙选题密不可分的。兰德成功地预测了中国将出兵朝

鲜。这是公司创建初期最成功的选题，同时也由此令籍籍无名的兰德一鸣惊人，从此让人刮目相看，出人头地。这个在兰德创建之初自发研究的“小”课题，却给它带来了如此巨大且长久的声望，恐怕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兰德巧妙选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关注国际热点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到60年代的越南战争，70年代的信息技术，再到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两德合并、后冷战时代战略，乃至最近的中东问题、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全球热点问题几乎无所不包。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其成果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从而在无形中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吸引到更多的业务的投资。兰德公司能够在创立后不久就得到各大银行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并受到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重视，除了其发起人的个人背景外，其在朝鲜战争预测方面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功不可没。

2. 开展了大量预测性的课题。预测性课题最大的特点是其结果是可以量化的，准还是不准、差距有多大，与最终发生的实际情况一对照就知道了。尽管预测类课题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预测准确为咨询机构所带来的声望要远远大于预测失败所造成的损害。

3. 研究角度偏重于宏观管理、规划层面，而不是深入研究一些专业技术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层次高、角度新，更容易引起高层管理者的重视；二是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虽然课题可能来自多个领域，但研究人员不必精通每个领域，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在各

方面都可以应用；三是辐射范围广，更容易为该领域之外的人甚至普通民众所接收，从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兰德公司通过巧妙研究选题，成功地占据了咨询业的高端领域，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且由于接触的多是政府、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因而也更容易获得资金和项目。

充分发挥专家作用，不断改进咨询方式

兰德公司虽然在建立之初就招募了各个专业的大量技术人才，但它仍然不可能做到对所有领域都十分精通。兰德为此采用“假力于人”的方法，即充分借助各领域专家的才能，从而得以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开展新课题研究。聘请专家为自己的课题研究献计献策是大多数咨询机构惯用的手段。兰德公司的过人之处不仅体现在敢于充分依赖专家的力量开展新领域、新问题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体现在其一直倾力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专家的力量，真正让专家的知识对自己有用。正是由于其对专家咨询方式方法不断进行的思考与改进，最终有了“德尔菲法”、“头脑风暴法”等一系列著名方法的产生，而这些理论方法也帮助兰德从专家那里获得了更多、更深入的智力支持。

重视培养高级人才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在社会上有“兰德学派”之称。兰德不仅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独创的见解著称于世，而且为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比如数理逻辑学家兼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伯特·沃尔斯蒂特，前中央情报局长、国防部